



和平心理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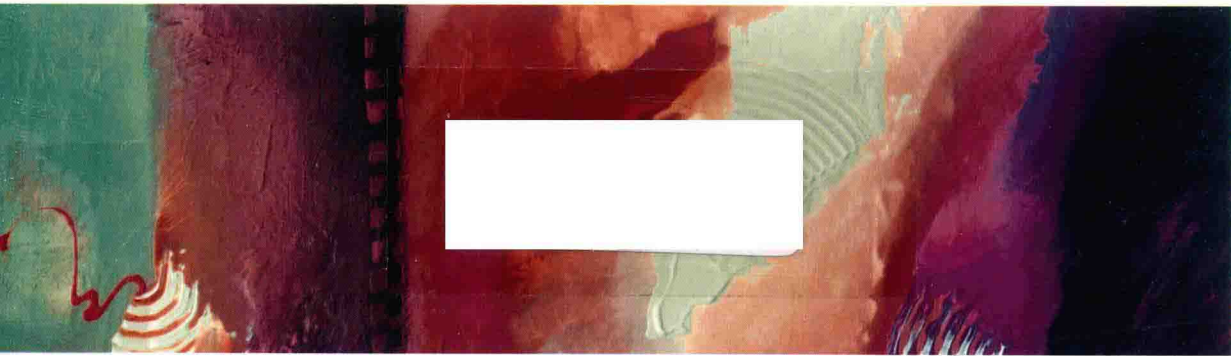
[美] 杜艾文 (Alvin Dueck)

[美] 凯文·赖默 (Kevin Reimer)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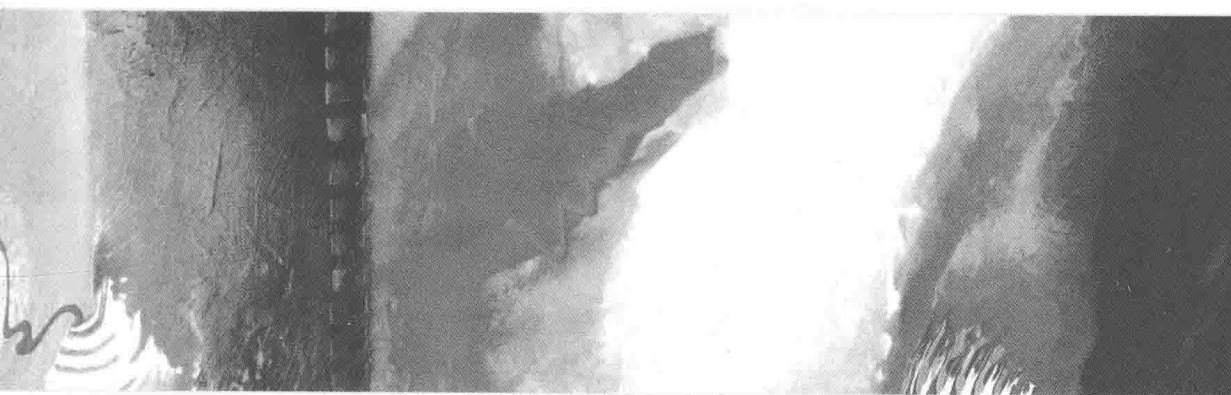
黄晓楠◎译

A PEACEABLE PSYCHOLOGY

CHRISTIAN THERAPY IN A WORLD OF MANY CULTUR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 PEACEABLE PSYCHOLOGY

CHRISTIAN THERAPY IN A WORLD OF MANY CULTURES

和平心理学

[美] 杜艾文 (Alvin Dueck)

[美] 凯文·赖默 (Kevin Reimer) ◎著

黄晓楠◎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平心理学 / (美) 杜艾文 (Dueck, A.), (美) 赖默 (Reimer, K.) 著; 黄晓楠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

书名原文: A Peaceable Psychology: Christian Therapy in a World of Many Cultures

ISBN 978-7-5161-6318-4

I. ①和… II. ①杜…②赖…③黄… III. ①信念—应用—精神疗法 IV. ①R749.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110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 彪
特约编辑 吕金凤等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75
插 页 2
字 数 328 千字
定 价 8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安妮 (Anne) 和琳 (Lynn)

书 评

这是一本具有挑战性和启发性的书。杜艾文博士和赖默博士针对现代基督教心理学和世俗心理学及心理疗法提出了深刻的评论。作者对心理治疗在我们多文化世界中的复杂程度的深刻见解，会挑战心理学者以及任何对宗教在现代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兴趣的人。

——勒龙·舒尔茨 (F. LeRon Shults),

挪威阿哥德 (Agder) 大学神哲学教授

杜艾文博士和赖默博士对心理学进行了细致的论述。他们的切入避开了个人主义疗法欠缺的问责性，而同时关注到治疗在多文化多环境中的微妙之处和潜力。他们先知般的声音响亮地为“软弱的力量”在造就一个能够培养灵魂和治疗创伤的“和平心理学”上所扮演的角色做出了见证。

——基思·G. 米多尔 (Keith G. Meador),

美国范德堡 (Vanderbilt) 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

对于有志于在非西方国家中发展本土心理学的人而言，《和平心理学》是一本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书。心理治疗师切忌用“浅表”的治疗方法，掩盖来访者潜意识中“深厚”的道德传统；治疗师同时还要帮助那些希望恢复自己“深厚”的文化和道德传统的来访者达成目标。

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儒、释、道”三教构成了华人最重要的文化和道德传统。根据本书的论旨，在中国和平崛起的今日，华人心理学者最重要的使命，是吸纳西方文明的菁华，以科学哲学为基

础，发展华人本土心理学，藉以建立各种契合于本土文化的心理治疗。

——黄国光，台湾大学心理学系终身教授

学术的最后宗旨，是让人类生活更美好。这本书是体现这一宗旨的精彩范本。通过为暴力的心理受害者进行治疗的亲身经历，作者雄辩地证明了心理学需要关注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以及他们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处境。缺了这些，心理治疗会成为废物！

中国的心理学者、宗教学者和人文社科学者通过这本书，可以反思一下自己的狭隘局限、偏见成见，从而开阔眼界，提升境界，更好地实现学术的宗旨！

——何光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现代临床心理学自弗洛伊德开始就有摒弃灵性、迎合世俗化的基因。尽管有冯特、詹姆士、荣格等人的强调与努力，但在科学主义的诱导与胁迫下，苦难、罪性、饶恕、慈悲、关爱、道德、信仰等在个人生命成长、成熟和群际关系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不断被淡化、弱化，乃至人不成其为人、几与实验室白鼠、线虫类动物等同。好在业界近年对此有所反思。《和平心理学》就是其中一本旗帜鲜明的代表作。2015年夏天APA四位高层领导因为美国心理学家参与关塔那摩虐囚事件辞职，本书五年前即公开说明并批评此事，体现了专业心理学工作者的良心（详见第二章）。

作为中国基督徒心理学家，我读该书感触良多。因为作者是根正苗红的 WEIRD 临床心理学家，却站在文化、学术、信仰等诸角度看皆属弱勢的群体角度，严厉批评现代临床心理学理论、技术及其从业人员临床实践中根深蒂固的强权趋势和为保持市场化供需规模经济所精心编制的互生模式，并着重论述了本土文化（价值体系）、语言（及其对关系情境的解释）和个人缘于宗教信仰的反省在疗愈中之不可替代性。

尽管实证主义主导的基础心理学成为学科主流，强调生命群体的共同规律，但是应用（临床）心理学作为另外一大学科取向，必须承认个体差异，否则应用心理学家就在闭门造车、无的放矢。比如，心理咨询师采用源于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的职业语言开展工作，而求助者采用习自家庭、社区并在身心灵成长的同时成为内部言语、用于思维的母语表达困境、期盼自己的心理困扰得到解决，多么大的鸿沟！《和平心理学》针对这一现实，提出了美好的愿景——虚己的治疗师向求助者学习！二者同工，建设和平本土心理学，开展和平的心理治疗。

中外心理学发展经验皆证明，心理科学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应用而非基础研究。尽管书中例子基于南美有天主教信仰的原住民、接受美国临床心理学教育的菲律宾心理学家、华裔美国人等情境，但是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对于中国读者（心理学家和求助者）皆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韩布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读过杜艾文、赖默合著的《和平心理学》后，本人感受最强烈的是作者对独特的宗教文化在宗教心理治疗中意义的阐发。作者对独特宗教文化的关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作者对西方主流心理学包括宗教心理治疗领域以实证为基础的文化霸权持批评态度；第二，作者对以本土文化为切入点、诠释性理解来访者内心痛苦的宗教心理治疗实践表示赞赏；第三，作者对从多元文化融合角度，不断丰富宗教心理治疗理论、方法与技术的前景充满期待。

总之，笔者认为，《和平心理学》是一部有思想深度、有实践根基、有跨文化视角的宗教心理治疗专著，非常值得正在探讨中国宗教心理学文化特质的学者、特别是从事宗教心理治疗的人员反复研读。

——陈永胜，浙江师范大学心理研究所研究员

译者序

《和平心理学》（A Peaceable Psychology: Christian Therapy in a World of Many Cultures）英文原著是2009年出版的。2012年秋天，我从富勒心理学院修完家庭治疗硕士即将回国的时候，杜教授问我，是否愿意参与中文书稿的翻译和整理工作。当时拿到手的，是好几位不同译者翻译的一些片段，前后不连贯，难免艰涩迷离。再去看原文，我才明白作者寓意之深，论证之严谨，可是没有好的译笔传达，实在心痛。我在富勒虽不曾修过杜教授的课，但是他对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和对中国多年的热爱，一直感动我，也激励我反思——自己在美国学到的所谓“正宗”的心理治疗，对于回来即将面临的中国本土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一边读他的书，一边探索我自己的文化身份，我在这样的背景下投入到这本书的翻译工作中。

此后的两年半里，工作和家庭之外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和译文“死磕”上。反复修改的过程，有苦有乐，更有许多收获和学习。始知翻译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文字的传达还是其次，真正的目标是忠实反映作者思想和精神。然而困难在于，塑造思想的，本身就有语言逻辑（这一观点其实书中也有涉及），有时候我站在译文和原文之间，面对语言的“巴别塔”，绞尽脑汁却只有无奈。

在这本书众多的翻译难题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书名。Peaceable这个词看似简单，却有不同的微妙含义，用作形容脾气品性的时候，是

一种“爱好和平，宁静平和”的意思，好似中文所说的谦谦君子，温柔敦厚。但 Peaceable 又有“使人和平”的含义。这就是为什么英文中的 peaceable kingdom 和 peaceable king 在中文习惯中都普遍译作“和平的国度”、“和平的君”，原因就在于这里的 peaceable 更强调人与人之间暴力不再、压迫不再。

我想，这也正是《和平心理学》想要表达的：西方心理学与帝国权力殖民思维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未经批判的假设和推论被当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世界其他国家和文化造成了许多已知未知的伤害。我们迫切需要一个严肃反思西方心理学的视角，一种从和平出发，以和平为最终目标的颠覆性的心理学。作者不是在批判某个具体的流派或技术手法，而是从宏观的伦理层面追问：苦难是什么？疗愈是什么？心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究竟是什么？西方心理学幻想的道德中立难道能保证内心的平安与外在的和谐？“西方专家”给其他民族带来的劣势感、削弱感，究竟是帮助还是更大的破坏？心理治疗，多少傲慢借汝之名悄然而至！心理学不能不理睬国与国、民与民的残杀。尽管心理学不是政治，心理学者的群体和协会也不是“维和”组织，但心理学无法脱离政治和文化背景而存在于真空中。

写此序之际，坐在上海的家中，我的书桌宁静安稳，然而我的心无法宁静——11月13日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令人震惊哀痛。多次的爆炸，扫射……上百人质，一个个如羊被牵到宰杀之地。这边厢，我听着温柔的古典音乐专心写作；那边厢，炸弹与机枪撕烂夜空。不在此地，却在此时，这世界所涌动的是不止息的痛苦与悲哀！那痛与哀向我们索要的，不是一个诊断标签，不是一套咨询方案，而是眼泪，是意义，是旷野中呼啸说——盼望在哪里？

我所认识的作者，不是那种给人“安慰剂”的“心理治疗专家”。当他与我同坐，静默，祷告，我知道联络我们彼此的灵的是和平。我所愿意促进的心理学，不是少数西方专家、学者的话语特权。在每一个文化的基因里，原本就有与生俱来自我疗愈、成长的心理力量。真正的医

治，不止于个体、私人的“平和”——和平与平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愿这本点点滴滴心血译成的《和平心理学》能祝福那些立志安慰受伤者的人。惟愿你们每一位，都竭力保守自己的心灵与诚实，脱去知识的骄傲与缠累，接受来自和平的洗礼，成为真正的爱的使者。

黄晓楠

2015年11月15日

目 录

书评	(1)
译者序	(1)
导论	(1)
第一章 苦难、症状和十字架	(13)
第二章 康斯坦丁、美国帝权与“洋基进行曲”	(37)
第三章 多元文化精品店	(73)
第四章 作为通用语的世俗语	(103)
第五章 术语重围之中的母语	(132)
第六章 深厚的病人与浅表的治疗师	(164)
第七章 道德：抽象和传统	(192)
第八章 神圣秩序和“百忧解上帝”	(213)
第九章 和平心理学	(245)
第十章 耶稣能改变什么？	(278)
结论	(299)
致谢	(319)
参考文献	(321)

导 论

假设你是一位基督教心理学家，受同事之邀在阿富汗的一个救援机构进行心理咨询。你被分派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郊外的一个诊所。红十字会成员同若干个穆斯林家庭都有联系。这些穆斯林家庭在美国推翻塔利班政权后刚刚返回家园不久。你的任务是为那些经受战乱、需要帮助的儿童提供专业的心理援助。索亥尔（Soheil）是一位九岁的男孩，在一场恐怖主义炸弹袭击中受了轻伤。通过翻译，他的父母焦急地告诉你，晚上索亥尔总将自己藏在他姐妹的衣柜里。有时他会干脆睡在那里。索亥尔时而会陷入恍惚，呆呆地盯住某处看好几分钟，父母跟他说话时他常常心不在焉。如此一来，索亥尔没办法和周围的人互动。索亥尔曾经喜欢踢足球，喜欢去清真寺祷告，还喜欢到当地小学上学，但是现在他对这些活动都提不起什么兴趣。在炸弹袭击发生之后，即使有来自红十字会的营养供给，他还是瘦了五磅。救援人员告诉你，在谈话治疗初期，即便是用玩具、水彩笔和纸来吸引索亥尔的注意，他还是不能进行眼神交流。你和索亥尔第一次见面，他的大姐安娜希塔（Anahita）留在现场做翻译。在你们的谈话期间，索亥尔时不时地会同他姐姐很快地说上几句。当你询问姐姐索亥尔都说过些什么的时候，她会耸耸肩告诉你索亥尔说他感到很难过。^①

这个案例很是棘手。索亥尔需要帮助，但是我们对索亥尔民族

^① 索亥尔（sø'heel），假名，用来代表生活在战乱国家的孩子，他们生活的国家

传统里面的治疗资源又有多少了解呢？当美国人以占领者的身份出现时，他们应该施以援助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纷争由来已久，基督教的心理治疗师有能力去安抚穆斯林男孩吗？我们以心理治疗师的身份出现，可以起到那么一点点表达和促进和平的作用吗？我们希望，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推进有关以下问题的对话：治疗，政治/种族以及宗教。耶稣对新的世界秩序（上帝的国度）具有的政治性宣言，以及他对穷苦人和弱势群体的赋权，是我们治疗的出发点。

我们需要一些粗略的定义。首先，西方的心理治疗从属于科学的范畴。但是，我们会从来访者和专业心理治疗师的角度来探索心理治疗——不管他们是西方的，还是本土的、非西方的。其次，按亚里士多德^①的传统，我们认为关系的建构在传统上属于一种政治现象。我们也会在这个框架内探讨权利的分配和对少数族群的声音的赋权。在我们看来，政治、种族和传统在语言学上是互相关联的。最后，我们的神学信念也与当代心理学/心理治疗相关。我们深知自己在这些问题上认识有限，难免会有疏漏，但是希望我们的观

（接上页）有阿富汗、刚果共和国以及伊拉克。本案例取材于凯文·赖默尔（Kevin Reimer）和阿尔文·杜克（Alvin Dueck）发表的文章，题为《邀请索亥尔：基督教关怀中的叙述与拥抱》（“Inviting Soheil: Narrative and Embrace in Christian Caregiving”），参见《基督教学者评论》35（2005）：205 - 220（*Christian Scholars Review*）。参见以下关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和平使者的文章。阿尔文·杜克（Alvin Dueck），凯文·赖默尔（Kevin Reimer）、约书亚·摩根（Joshua Morgan）、史蒂夫·布朗（Steve Brown）：《让和平兴盛：冲突转换学习中的描述性与应用性研究》（“Let Peace Flourish: Descriptive and Applied Research from the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Study”），选自《穆斯林和福音主义基督徒之旁，之间和之外的和平缔造》（*Peace - building by, between, and beyond Muslims and Evangelical Christians*）。穆罕默德·阿布-尼莫（Mohammed Abu - Nimer）和戴维·奥格斯伯格（David Augsburg）编辑，233 - 254（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9）。

①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政治学》（*Politics*）中认为，人天生就是政治性动物，这个动物的本质是生活在城市语境下不同的关系中。选自《亚里士多德选集》（*The Works of Aristotle*），W. D. 罗斯（W. D. Ross）、B. 周易特（B. Jowett）、J. A. 史密斯（J. A. Smith）译，1252 b30 - 1253 a3（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点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20 世纪,心理学实践以医学科学的方式进行,采用的是一种客观的、普世的视角,认为人有能力超越特定的传统。对于这种方式的心理学实践,我们并不太怀疑它的可取之处。但是,在本书中,我们将会探索另一个不同的范式。借此,我们希望能够激发对具有神学、文化和政治敏感度的心理治疗的讨论。^①

按照西方模型,索亥尔的案例会和以下的心理学术语产生关联:“创伤”、“抑郁”和“自我”。这些心理学概念在西方心理学治疗中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这些术语除了对治疗索亥尔的治疗师有直接价值外,还负载了政治和文化的含义。在美国,心理学术语可以完全不带政治色彩地出现在晚间新闻、公立学校课堂、研究项目和周日讲道的圣坛上。成千上万的北美人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他们会靠吃药来辅助,靠写书来促进。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心理学词汇主导了当代人性的定义,我们又用这个定义来诊断和治疗心理病症。这些词汇的使用极为广泛,很少有人从它们的政治含义或来访者本身的语境去理解。

① 我们对政治在神学上的理解受到威廉·卡瓦诺(William T. Cavanaugh)的影响。卡瓦诺分析说,政府、民权社会以及全球化(state, civil society and globalization)是三种猜想时间和空间的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其深刻的神学的猜想和隐喻。比如说,现代政府就建立于从暴力得到拯救的耶稣救世学中。将政治等同于想象给人以希望,因为想象某事就是承认其历史偶然性,当前政治事务就有可能发生变化。神圣的社区是想象和实现不同政治的聚集点。参见威廉·T. 卡瓦诺(William T. Cavanaugh)的《神学政治猜想》(*Theopolitical Imagination*)(London: T. & T. Clark, 2002),以及斯坦利·豪尔瓦斯(Stanley Hauerwas)和罗曼德·科尔士(Romand Coles)的《基督教、民主以及激进的普通者:激进民主人士和基督徒之间的对话》(*Christianity, Democracy, and the Radical Ordinary: Conversations between a Radical Democrat and a Christian*)(Eugene, OR: Cascade Books, 2008),以及谢尔登·S. 沃林(Sheldon S. Wolin)的《政治与幻想:西方政治思想的继承与创新》(*Politics and Vision: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Princeton, NJ: Woodstoc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从荣格视角用政治分析心理的文章参见安德鲁·塞缪尔(Andrew Samuels)所著《政治心灵》(*The Political Psyche*)(London: Routledge, 1993)和他的《长榻上的政治:公民身份以及内心生活》(*Politics on the Couch: Citizenship and the Internal Life*)(New York: Other Press, 2001)。

出于对索亥尔的考虑，我们认为不加批判地使用西方心理学概念会为治疗带来阻碍。我们并不是在争辩索亥尔是否遭受了“创伤”、“抑郁”和“社交障碍”。我们所关心的是，按照西方心理学的纯客观态度生搬硬套这些词汇，会无视甚至亵渎这个男孩的传统文化所珍视的部分，同时忽略了在实施关怀与治疗时所处的政治语境。索亥尔来自一个保守的、有宗教信仰的穆斯林家庭，他们的国家饱受战乱，生活在超级大国的巨大压力之下。在他的环境里，“创伤”反映的苦难，与道德、宗教、战争有直接关联。创伤绝非一个中性词。世界属于上帝（安拉），它反映的是宇宙中善与恶的灵界冲突。苦难最终包含在对安拉意志的理解之中。索亥尔的宗教世界里没有“抑郁”这个词，如果让他描述“抑郁”，会出现语言学上的真空。人们会经历悲痛，但在他们看来，这不一定就是心理障碍——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对索亥尔而言，“悲痛”，就是在美国军事力量下的丧亲和苦难的生活。这在一个每天都有罪行发生的地方是一个典型事件，只有通过顺服《古兰经》的教义才能赎罪。一元的、非政治的“自我”概念是荒谬的。在他的世界里宗教和政治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构成索亥尔的“自我”的每一个因子在现实中都直接指向他的灵魂、他的伊斯兰教信仰，以及他与他人的关系。无论是索亥尔还是他的父母，都根本不会理会西方人所说的自主性的自我。这个男孩履行义务的对象首先是安拉，然后是他的父母和家庭，最后是他政教合一的社区对他的期待。即便坐在索亥尔对面的心理治疗师满怀好意，他那基于西方心理学概念的治疗对索亥尔来说也是陌生的，甚至可能对他的传统具有损害性。这里要冒的一个巨大风险是，客观的、与政治割裂的西方心理学会损害索亥尔自己的种族和宗教叙事系统，使恐怖主义炸弹袭击对他造成的伤害持续下去。不仅如此，如果治疗师来自美国，他/她也许会认为美军进驻阿富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为了将阿富汗人民从塔利班政权中解救出来。但是，如果索亥尔的想法不是这样，那么这位治疗师能意识到自己的心理治疗中包含政治属性吗？

乍看之下，西方心理学家也许会认为这些担心荒谬可笑。过去二十年来，种族和宗教问题的临床敏感性出现了复兴。全美国范围内的心理学培训部门针对多元化（diversity）采取了全面的培训项目。作为心理学临床教育的黄金典范，美国心理学会（APA）排除万难，意在根据来访者不同的种族、宗教和性取向，来提高心理学实践的敏感系数。有到过类似阿富汗等地经历的西方心理学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心理学家，更能够处理索亥尔及其当地传统的问题。对于这些批评家们，我们的担心不啻是无事生非了。

不仅如此，跨文化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不断发展，为心理学领域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心理学家开始熟悉人类学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学科^①。因此，心理治疗师对多元文化达到了一定的敏感度，使得他们能够将治疗有效地建立在索亥尔的信仰上，来帮助他康复，甚至摆脱最严重的压力源。我们同意，这些趋势使得现阶段西方心理学相对过去而言变得更加有效和妥当。但是我们依然感到，即使存在这些进步，我们这些西方心理学者还在继续向世界各地传输心理学的词汇和语法，并假设它们对其他文化是普适的^②。

我们反对用多元化框架下的民族与宗教去削弱类如索亥尔所生活的文化传统，使之从神圣传统沦为一种工具性的效用。我们需要揭示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种族和宗教只不过是适用于治疗改变的实用工具，而这种治疗改变取决于心理治疗师自己的界定，并且是其优先考虑的事情。不管索亥尔对“治疗”有怎样的理解，都被弃而不顾。安拉或《古兰经》只是实用工具，用来与这个男孩建立密切的治疗关系。当使用索亥尔的

① 理查德·A. 史威德（Richard A. Shweder）、马萨·米诺（Martha Minow）、哈泽尔·马库斯（Hazel Markus）编：《探寻文化差异性：自由民主中的多文化挑战》（*Engaging Cultural Difference: The Multicultural Challenge in Liberal Democracies*）（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2）；亚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悲伤与疾病的社会起源：现代中国的沮丧，神经衰弱与疼痛》（*Social Origins of Distress and Disease: Depression, Neurasthenia, and Pain in Modern China*）（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8）。

② 神经心理学的研究确实可能更普世些，但是在社会 and 人格研究中就很少如此。

语言可以更加清晰地勾勒他的病状时，那么这种对其语言的运用就变成一种临床上的优势，并且其关联的语言也更容易被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多元化”是为了服务于这种治疗的核心目的，即对症状进行客观地处理，这种治疗模式把人性固定在一套基本的西方词汇之中。索亥尔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也被框住了，甚至他本人都不再是治疗参与者。对本土宗教信仰和政治的谈论，也只能从页脚的注解中找到——就如同一棵盆栽植物，静静地在办公室的一角，落满尘埃。在这种情况下，索亥尔的种族和宗教传统变得毫无生命力，或者说失掉了神圣性。他的政治处境在治疗中显得无关紧要。

我们承认，对于缺乏明确的民族或宗教身份感的美国人来说，西方心理学的普适性与某些民族文化传统的独特性之间的冲突也许是无关痛痒的。但对那些有确定种族和宗教身份的人来说，把普适性如此应用到临床工作则会令人非常忐忑不安。举个例子，用工具性的（instrumental）方法来治疗非裔美国人的身份感和灵性问题，这种做法也许会腐蚀那些为摆脱黑暗的奴役制度而孜孜以求的几代人的神圣记忆。相比索亥尔而言，“创伤”、“抑郁”、“自我”也许更容易得到非裔美国人（来访者）的认同，但是这些词汇的意思并不一定等同于西方心理学普适性的词意。每一个词条背后象征的苦难都会让人想起非裔美国人独一无二的习语和隐喻特征。没有政治意识的心理学家会轻率地将这些概念与工具性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应用到非裔美国人的民族性和灵性上，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也许正将来访者社会化到一个陌生的模型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还不能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治疗结束时，来访者会对治疗有一些微小的、不自然的理解，这来自他们无意识地接受了那些没有历史意识的心理学家的话语和解释。来访者也许会感到奇怪，这些新的心理学词汇不仅不能让他和家人与朋友产生共鸣，反而导致了微妙的怀疑。来访者也许会处在一个难以言喻的“进程”之中——暂时脱离了他的心理症状，却在方向上似乎偏离了非裔美国人的灵性。